

• 历史研究 •

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中的唐绍仪

周 棉, 魏善玲

(江苏师范大学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江苏 徐州 221009)

摘要: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和社会转型的巨变中, 唐绍仪是一位大起大落的著名人物。在少年时代, 他以幼童身份出国留学, 被撤回国后辗转进入仕途, 由最初清王朝的一般涉外官吏, 累迁至对外事务大臣。辛亥革命以后, 他以“拥袁共和”的形象出现在南北议和的舞台上, 并荣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此后, 他为谋求共和统一而四处奔波。面对袁氏及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 他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袁、护国护法的道路。作为一名留学生出身的年轻的新型外交家、政治家, 他竭力维护民族权益, 为民主共和政治而不遗余力。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 唐绍仪因势利导, 纵横捭阖, 鲜明地留下了新型的政治家、外交家的足迹。

关键词: 唐绍仪; 清末民初;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 K25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13)05-0127-05

清末民初是中国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转型的特殊时期, 留美幼童出身的著名人物唐绍仪, 把握历史潮流, 坚持国家利益和民主宪政原则, 以其学识、胆略和才干, 在民族危亡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剧变中, 表现出了新一代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风采。

一、清末维护民族外交权益的新型外交家

唐绍仪(1862—1938), 字少川, 出生于开风气之先的广东省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茶商家庭。1874年, 他被选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虽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 留美幼童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业而被中途

撤回, 唐绍仪也未能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但他接受了西方初等、中等教育和部分高等教育, 养成了具有西方色彩的世界观, 形成了现代国际关系理念、民主共和思想和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处事风格, 这为他日后成为新型的外交家、政治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清末民初的一些重大涉外活动中, 最能显示唐绍仪的风采。

1. 出使朝鲜初显外交才干

1882年7月, 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从巩固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和防止日本借事要挟考虑, 决定出兵。10月, 清朝前驻德国领事穆麟德被派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 唐作为穆的秘书前往, 很快表现出了出色的外交才干。1884年12月, 朝鲜发生“甲申政变”, 亲华的朝

收稿日期: 2012-12-06

作者简介: 周棉(1956—), 男, 江苏沭阳人, 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魏善玲, 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为周棉主持的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与文学的变革”(10BZW081)、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1&ZD101)的阶段成果。

鲜大臣闵泳翊带剑伤逃到穆宅避难。其时,唐绍仪正在穆宅,遂主动持枪到门外护卫,而此时奔赴穆宅了解政变情况的清军总理“前敌营务处”的袁世凯,对唐的机智勇敢赞叹不已,认为唐是个智勇兼备的难得人才。1885年末,唐被时任“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收入麾下,任袁氏汉城公署的西文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由此唐、袁开始了政治上的合作。其后,在1890年汉城的“撤栈事件”中,唐绍仪据理折服俄国公使,初步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外交风格和斗争艺术,为保护清政府的领事裁判权作出了贡献。甲午战后,在袁世凯的推荐下,唐绍仪再次被派往朝鲜,后任总领事,直至1898年9月。唐绍仪在朝鲜16年,在维护清朝与朝鲜的宗属关系和处理甲午战争前后复杂的中日关系中初露锋芒,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这为他以后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2. 任天津海关道再展外交才华

清末,河北、山东一带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引发了一系列的宗教涉外事件。1899年底,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将唐绍仪调任山东洋务局总办。具有多年留学美国经历的唐绍仪非常理解宗教在西人心目中之地位,明察中国人与之发生纷争的原因,逐步清理,很快地了结了教案纠纷,使山东混乱的局面得以安定,进一步表现出了外交才干。袁在专折中称赞他“才职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实为洋务中杰出人员,环顾时流,实罕其匹。”^{[1] (P361)}因此,袁世凯在1901年11月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唐绍仪也被袁奏调到天津任海关道一职。

此时,天津仍在列强手中,设有“都统衙门”管理天津。因此,唐绍仪在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接收天津。他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加速了接收天津的各项谈判,洋人对他颇为敬佩,最后议订各国交还天津条约13款。1902年8月15日,都统衙门正式将天津主权归还中国政府。与此同时,他又与英国交涉收回关内外铁路问题。按原中英所签订之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中国督办路权旁落。唐绍仪曾任关内外铁路总办一职,深知其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因而能掌握谈判的关键。1902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了《英国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及《关

内外铁路交还以后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国管理和统辖该路的权利。至此,关内外铁路全线接收的工作顺利完成,开始了我国收回外资铁路自办的新阶段。

3. 参加中英西藏谈判,竭力捍卫中国主权

1904年9月7日,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完全控制了西藏。此事激起了沙俄等列强的群起反对。在此情况下,唐绍仪被委以议约全权大臣,与英国代表谈判西藏问题,既要抵制英国势力侵入西藏以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又要避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

1905年2月,唐绍仪一行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与英使费利夏谈判。其初,英使便要唐绍仪在英藏私订之约上签押。唐绍仪以严厉的外交辞令进行反驳“约尚未议,何能遽签”“贵国既接待议约,则我自有商议之权。中英之所以必须会议者,因西藏之主权在中国也。藏约既有干犯中国主权之语,自应解释明白。”^{[2] (P181-82)}英使理屈词穷,无奈让唐绍仪重新拟稿。唐绍仪不仅删除了原约中有损中国主权的条款,还特意加上了“英国无有侵占西藏之意”的语句等。对此,英使费利夏哭笑不得,声言“此稿断不能更改”。此后历次会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中藏”的关系问题。面对盛气凌人的费利夏,唐绍仪郑重声明“西藏主权在于我国,荣赫鹏与我国藏僧数人私立约书,我方自有权不承认。”如此强硬的外交态度是清朝外交史上所罕见的。当英使蛮横地声称此乃最后一稿不容再改时,唐绍仪再次声明“英国与藏僧立约,只有一面,并非两平等国,不能视为已得权利。若照此稿,我断不能画押。”^{[2] (P183)}双方谈判陷入了僵局。唐绍仪看到英使事事仰承印督寇松旨意,明白只要寇松不去职,则此次谈判就不会有好结果。鉴于此,1905年,唐绍仪毅然停止谈判,整装回国。在清政府此前的对外交涉中,东西方列强经常以中止谈判的方式要挟中国,而此次则截然相反,是中国主动中断谈判,这使英使受到很大震撼。不久,寇松被撤职回国,而英国政府也因内阁更换对西藏转用保守和平之策,不得不同意由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与新升任外务部右侍郎的唐绍仪重新谈判,而且谈判地点移至北京。这表明主动权已在

中国。1906年4月27日,中印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续订印藏条约》,对《拉萨条约》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英国承诺不兼并西藏,不干涉西藏政治活动。尽管条约中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得到了确认。该条约的签订既是唐绍仪外交的成功,也是中国外交的胜利。

4. 力图收回路权和海关权

20世纪初,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因主持路政时失权过多而成为众矢之的。1906年唐绍仪接任遗缺,对铁路进行大力整顿。首先,扩大对外资铁路的行政管理权以挽回利权。如在整顿京汉铁路过程中,唐绍仪一方面坚决执行原借款合同中国应保有的权力,一方面积极推动路政的各项改革,旨在排除洋员对路权的操纵及其不良影响,使华员逐步掌握该路的管理大权。他认为,1903年盛宣怀与英国签订的《沪宁铁路借款合同》,中国吃亏的要害在于设立总管理处。因此,要挽回利权就应从改订管理处章程着手。于是,他改拟章程,并多次与英国公司及其代理人商议,为后来接任他的梁士诒与英国人继续交涉打下了基础,并最终收回了部分路权。最能体现唐绍仪对外资铁路政策的是1906年11月他亲自与英公司签订的广九铁路借款合同。该合同与盛宣怀过去签订的那些外债筑路合同相比,最明显的区别是删除了由外籍总工程师总揽管路大权的规定,从而取得了筑路的主权。

这一时期唐绍仪还致力于收回海关权益。1906年5月7日,清政府宣布设立税务处,并委任唐绍仪为会办税务大臣。他走马上任便改变海关的隶属关系,使总务司赫德仅成为税务处的一个高级雇员。赫德对此自然不满,第一次拜访唐绍仪时,他居然违背当时下属初见上司必须用“手本”的惯例,而唐则故意避而不见。后来,赫德只好持“手本”去拜见。唐绍仪却故意不开中门,让赫德走侧门,进门后也只是让他坐在一侧,而自己端坐正中,主次分明。此事虽小,却体现了唐绍仪不媚洋员、维护国格及人格的尊严和规范行事的个性特点。这让赫德威风扫地,明白“税务处的出现意味着总税务

司的放逐”^{[3] P1508}。此后,唐绍仪又着手改革海关内部的外籍税务司制度,采取强硬措施,迫使赫德颁布重用华员、限制洋员的通札。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唐绍仪的做法并未能最终收回我国海关的管理权,但他力图收回中国海关权的努力,表明在节制海关洋人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动摇了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

由上可见,在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中,唐绍仪以丰富的国际知识和深谙外交法理的新型外交家的面貌出现在晚清艰难的外交活动中。他坚守民族利益的原则,采取不卑不亢、积极主动、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所交涉的一些重大外交事件都得到了尽可能有利于中国的解决,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权益。

二、民初推动民主共和政治发展的新型政治家

从武昌起义爆发后被推为北方议和代表,到辞去内阁总理职务,这段时期是唐绍仪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归国从政以后,有感于国家的衰败,他形成了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并在政治实践中受到了锻炼。他顺应民主共和的时代潮流,在南北和谈中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出任总理后竭力维护责任内阁政体;辞职后又为维护约法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鲜明地展现了其新型政治家的风采。

1. 担任北方议和代表,促成共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唐绍仪被袁世凯委以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对于南方革命党人来说,唐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最佳人选。因为唐不仅是南方人,且有留学生经历,并多年从事外交,了解世界大势,自然不会顽固守旧。为了和谈的顺利进行,他多次致电袁内阁,要求饬令各军队一律停战。他甚至在谈判中向南方代表伍廷芳提出了南北联合以实行共和立宪的政治主张。为了使袁世凯和清政府接受这一协议,他在致袁的电文中强调“民军之宗旨,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行会议。”^{[4] P223}因此,他在南北议和中不仅有意夸大南方革命党人的力量,促使清廷尽快下台,以扫除南北议和的障碍,而且尽量采取妥协方针,以促成和议成功,还倡议召开国民会议,以实行共和立宪政府。可见,唐绍

仪名义上作为清廷代表,但由于他真心实意地希望南北停战和谈,因而采取了“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的议和纲领。正因为此,南北议和在短时间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但由于其达成的南北议和协议得不到袁世凯的同意,他只好辞职,但仍留在上海,推动南北停战议和。这一时期唐的政治立场离清廷和北洋集团愈来愈远,而与同盟会愈靠愈近。这些事实说明,作为一个新型的政治家,唐绍仪已经跳出了个人利害得失的藩篱,而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趋势为重心,从而为实现南北停战及推动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2. 荣任内阁总理,恪遵约法

1912年2月14日,按南北议和协定,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南北实现了“统一”。为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南京临时参议院在孙中山离任前通过了《临时约法》,其主旨是要在中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当酝酿内阁总理人选时,唐绍仪众望所归,成为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1912年3月25日,唐绍仪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

在组阁之初,唐绍仪怀有极大的抱负,力图治理好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改造和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愚昧的社会风俗”^{[5] (P66)},以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为此,他努力推行责任内阁制,但袁世凯却无视法律和规则,安插亲信到各要害部门以控制内阁,使得作为总理的唐绍仪无法行使职权。尤为严重的是,袁世凯还绕过唐绍仪直接插手部务,尤其是副署制度,将内阁总理架空。崇尚西方民主政治的唐绍仪“事事咸恪遵约法”^{[6] (P302)},力图“使民国开幕之内阁,不致留贻污点,养成尊重法律之美风,杜绝不当干涉之陋习”^{[6] (P302)}。为此,唐绍仪不惜中断与袁世凯数十年的友谊,于6月15日提出辞呈。以辞职来捍卫“约法”的尊严和内阁的权威,表明了一个新型政治家的高风亮节。

唐绍仪任内阁总理虽然不足3个月,但他在组阁期间处处强调内阁总理副署权;在其总理任内,按照共和政体的要求实施总理职能,维

护约法尊严的举动,对于后来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反袁称帝,投身护国护法运动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唐绍仪成为国民党备补参议。其时,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搞垮了国会、废除了《临时约法》之后,为实现他的皇帝梦,竟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1915年8月,当杨度等人在袁授意下发起“筹安会”以请愿实施帝制之后,唐绍仪立即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及汪精卫等联名致电袁世凯,发出“严厉警告,使即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6] (P303)}。在当时国民党已被非法解散,国内处于万马齐喑的情况下,唐绍仪与袁决裂,进行公开斗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继唐氏之后,各省反对帝制者纷纷响应。此后,他便积极投入到反袁称帝的活动中。蔡锷在云南宣布起义后,他立即在上海奔走,竭力争取国际力量支持护国军倒袁。当袁世凯撤销帝制,竟然还想为继续做大总统而进行活动时,唐又再次从上海发出《忠告袁世凯退位电》:“自从帝制发生,以至云南、贵州起事,举国骚扰,不可终日。我虽然长久不愿发言,但因国事重大,也万难漠不关心。近日阅报获悉,执事撤销了承认帝制之命令,但仍居总统之职。执事之意,以为这样就可以敷衍了事。只是在天下人看来,都以为这样做是丧尽了廉耻道德,也是有史以来的中外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7] (PP638-639)} 语言之犀利实非一般旧友所能发出。当冯国璋以调停之名在南京召开会议并提出8条方案后,唐绍仪又立即率领寓沪各省公民13000人通电严斥,提出只有袁氏引退,才能解决今日时局。唐绍仪的这些言行,不仅表明他与袁世凯的决裂,更显示了他在国体问题上的鲜明立场。

以后,随着袁世凯的死去,段祺瑞又故伎重演,公开宣称不要约法、不要国会、不要旧总统,同时决定改组国会,重新建立立法机关,颁布新宪法,力图从根本上确立并巩固皖系北洋专制政府。而唐绍仪则认为民国“精神所寄,全在约法”,要“遵守约法,则不能不召集由约法产生的国会”,“袁氏称帝,实因解散国会破坏约法始”^[8]。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则

决心以旧国会为基础,以武力争回法统。于是围绕着《临时约法》的废除和恢复以及旧国会的存去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其实质是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之争。在这场角逐中,唐绍仪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孙中山倡导的护国护法运动中。1917年9月,唐绍仪任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的财政总长。军政府改组以后,又被推为七总裁之一。1919年,唐绍仪接受南方军政府委任,作为南方代表参与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议和。在会谈中,唐绍仪否认段祺瑞的御用工具“安福国会”的合法性;要求北京政府废止秘密签订的中日军事协定及“二十一条”;不承认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合理决定等。为此,1920年,唐绍仪又抱定民主法治之观点,参加了二次护法运动。

由上可见,唐绍仪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拥袁共和”的主张被推为北方议和代表,又以赞成共和立宪的思想推动了南北和谈的进程;出任内阁总理后,他恪遵约法以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维护了内阁的权威和约法的尊严;从内阁总理任上辞职后,又不遗余力地反袁称帝,推动了护国运动的发展;针对段氏破坏《临时约法》的倒行逆施,又转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概言之,在清末民初中国空前的社

会转型中,唐绍仪把握时代潮流,站在时代前列,坚持民主共和立场,推动了中国从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的转变。在共和政体遭到践踏之时,他又坚定地坚持法治原则,甚至为维护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不惜抛弃高官厚禄;在南北争斗复杂的政治洪流中,纵横捭阖,奔走呼号,在中国的宪政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 [1]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出版社研究所.袁世凯奏议:上[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 [2]陆兴祺.西藏交涉纪要:上编[Z].民国20年.
- [3]费正清等.总税务司在北京[M].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
- [4]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丛刊·辛亥革命:八[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5]朱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李希泌.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Z].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唐绍仪.致赣督电[N].中华新报,1917-07-11.

责任编辑 张正云

Tang Shaoyi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Turn of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ZHOU Mian & WEI Shan-ling

(Research Center for Overseas Students and Modern China,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dramatic regim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10s, Tang Shaoyi was a famous personality with ups and downs. In his boyhood, he was sent to study abroad, but was withdrawn midway to serve the imperial court, starting from an ordinary diplomatic official in the Qing Dynasty to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he appeared on the South-North negotiation stage as “advocator of Republic under Yuan Shikai administration”, and served as the first cabinet 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n, he went all out for a republican and reunified China. In the fac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acts of Yuan Shikai and the northern warlords, he unswervingly took the side to oppose Yuan Shikai and to protect the Republic. As a youthful new diplomat and politician with 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 he tried his best to defen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pared no efforts in fighting for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olitics, with unique contribution to China’s new educ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hina’s traditional society to a modern society, Tang Shaoyi capitalized on the trend, and maneuvered among all powers, leaving behind a trace of new type of politician and diplomat.

Key Words: Tang Shaoyi; the turn of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social transformation